

龍冠海教授的生平與學術—— 東西文化洗禮下中國社會學家的一個例子

章 英 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一、龍冠海教授的生平¹

龍冠海教授在 1906 年生於海南島的農村，家中半農半商。幼年時，先入村中的學校，讀了一年傳統私塾的課程，便在一位年輕老師的引領之下，接受了新式的小學課程，旋又轉入高等小學，也在那時候，初次接受英文。以同一時期人的教育歷程而言，他對現代教育的接受，算是較早的，特別是在素來被視為落後的海南，這更是特別的經歷。十歲左右，因父親過世，稍稍輟學之後，便渡海投靠馬來西亞的叔父，原以為是學習商賈，但他叔父卻送他去新加坡就讀華僑中學。就讀的數年之間，一方面擴大了他對西方知識的接觸，一方面也知道了中國本土的白話文學運動。讀了三年之後，適逢清華學堂在馬來半島招考學生，龍教授是唯一的錄取者，就這樣子在 1923 年進入中等科四年級。那時候的清華學堂係留美預備班，龍教授日後的學術生涯在此時大致已埋下了伏筆。

龍教授在清華學堂從中等科到大學一年，共唸了六年，是他自認為一生的黃金時代。他在這段期間，修習社會學的念頭還未在他腦海之中，只是從教育學、市政學、經濟學、以及文學的各方面多所接觸，希望找出自己未來的方向。依他自己的回憶，這六年間獲益最多的，一是西洋史和西洋文學概論，一則是在陳文波和蔣復璁先生教導之下，修習像孟子、墨子和王陽明傳習錄等中國的經典。這和他攻讀社會學之後仍從事古典思想的研究，應該有很大的關聯。之後，他先插班進入史丹佛，再進南加大的研究院攻讀社會學的碩士與博士學位，其學位論文是有關中國社會思想的研究。他在自己讀研究院時的回顧中，便認為在文化的洗禮上，他自己是個混血兒。在性格上，他似乎也顯現了西化與中國傳統之間的矛盾。在留美前，他修書回海南，拒絕了他認為沒有感情的婚約。在越洋前逗留上海之時，進入舞廳而未入舞池，坐在一旁還念念跳舞是否好東西，是否適合中國人，自己在美會不會學會跳舞。

中國的動盪與落後，在他的生命歷程中，也扮演著相當的角色。在北京的六年間，

曾在學生運動遊街中，經歷過軍隊開槍掃射，無痒而回。在清華的學術涉獵，抱持的標準是是否有益於社會，而修習社會學，原來就抱持改良我們社會與增進人類福利的想法。在1930年代中日情況逐漸惡劣之時，他正在在美國攻讀學位。當時的美國輿論界充滿著偏向日本的言論，他爲文反駁南加大學生日報指陳東三省爲日本所有的社論，此後便受邀約與在美日人辯論，並發表數次的演講。他寫了幾封英文信去遣責發表危害中國的言論的美國人士，包括著名的專欄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man），他還修書給法國文豪羅曼羅蘭，日本的基督教知識份子賀川豐彥，也都是談論日本侵華的事情。在1925年學成歸國，任教於金陵女子大學的社會學系，不久即因抗戰而隨著學校遷往成都。神州變色，他亦輾轉來臺，任教於臺灣大學，展開他後半生的學術生涯。他與同時來臺的幾位社會學家，共同恢復了中國社會學社，創設了臺大社會學系。他一直不滿共產主義，曾在討論社會學在中國發展的數篇文章中，指陳一些社會學家的錯誤選擇，以及在共產社會的乖舛命運，也爲文批判共產主義（1974b：21-24；51-55；82-84）。他並不受官方的歡迎，也不善經營與官方的關係，但堅決反共，還相當推崇三民主義和「倫理、民主、科學」的說法（1970：150-188；1974b：30-31；45-46）。總之，他的這些作爲與想法，顯現了極其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

龍教授在臺灣的三十餘年，大部分的心血都花在臺大的社會學系，相較於他的前半生，算是平穩而平淡的。在他晚年的一段言詞裡，似乎也是淡然回顧自己的一生，他回首二十幾冊自著與編著的作品，相當滿意於自己在工作崗位上的盡忠職守和真實報導所見所知，至於其意義與貢獻則留待讀者去評判了（1974b：2）。龍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大致可以分成三個方面。第一是臺灣社會學界的建立，包括臺灣大學的設系，中國社會學社在臺灣的重建。第二是社會學知識的推廣；第三則是經驗研究的推動。他第一方面的成就，在很多紀念文字中，都詳細介紹了，因此本文側重他在第二與第三方面的評述。

二、社會學知識的介紹與推廣

龍教授在社會學知識介紹上，自著和主編了六本教科書（1952；1954；1955；1966；1967a；1967c），最廣被的是在臺灣社會學教育上使用甚久的三本教科書，即自著的社會學（1966；1967a；1967c）與社會思想史和編著的社會研究法。其社會學一書，與坊間國人自著的其他教科書相較仍有其特殊的位置。理由在，它是唯一一本有著明顯副標題的社會學教本，一開始便揭櫫社會學爲研究社會關係的學科，而所有的章節，都是以之與社會關係的關聯而加以探討。當然這很可能是在社會學範型相當穩定的1960年代的

作品。但是他還是從諸多的定義之中，取了他認為較佳的且較合於中國人的觀念的作為貫穿全書的主軸。他明白說道，社會關係的概念比較合乎我們中國人的看法，特別是儒家思想所代表的，即著重人倫的探討，與強調人的關係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認為這是人類問題中的中心問題，儒家對人的看法有些地方近乎近代社會學的，倒是不可否認的事實（1966：16-17）。近十年來，已有好幾位學者企圖從關係的概念去瞭解中國社會特質。這一本社會學教科書，比起大部分的其他教本，比較沒有拼湊的痕跡，是費過一番統一化和系統化的心力的。

龍先生發表過許多短文傳播社會學知識，討論社會學的發展，與批評眼見的社會現象，我們可以由張承漢和林義男兩位教授編的龍冠海教授著作目錄得知其寫作的範疇。這些文章絕大部分都已收入他陸續出版的文集，社會調查概述（1963）、社會與人（1964）、社會學與社會論叢（1964）、社會調查與社會工作（1970）、社會學與社會意識（1974）。大致可以將這些文章歸為以下幾大類：一、社會學的一般概念與發展的趨勢，二、中國與臺灣社會學的發展概況與期望，三、社會學方法，特別是調查法，四、社會問題與社會工作。

龍教授本人所最敬佩的社會學家大概是索羅金（Pitirim A. Sorokin）了。他曾為索羅金的《今日社會學學說》的中譯本作序（1974b：150-151），為他的自傳以及《今日社會學》二書評介（1970：206-214），並在獲知索氏去世的消息時為文悼念（1970：203-205）。索氏在美國雖有地位，但其學說並未對美國的社會學界有實質的影響。龍教授認為索氏學問的淵博著作之豐富和批判的深入，在同時的社會學家之間，無出其右者。他應該受到索氏《社會與文化動學》相當的影響，在他〈當代知識分子的悲哀〉文中，便引用《社會與文化動學》的感覺文化（*sensate culture*）的概念，同意索氏以感覺文化來描述近代西方社會。感覺文化的特徵是注重物質生活的享受，而忽略精神生活與理想的維持。他認為，不只是西方的知識分子，東方的也受到這文化主流的影響（1974b：40-41）。他對1950年代當紅的結構功能派大師，派深思（Talcott Parsons）和墨頓（Robert K. Merton），並不十分欣賞。他評介《今日社會學學說》時，特別指出，索氏對派、墨二氏的評論，應令以二氏理論為主臬者，耳目一新，而有所感悟（1970：213）。龍先生曾受文星雜誌之邀為文簡介派深思的理論，他明白說，自己雖在派氏未成名之前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暑期部修過派氏的課，但從來不敢承認自己對派氏有真正的了解，也不敢宣稱自己曾受業的經歷。在文中，稍稍提出個人對派氏的認識，一般對派氏的評論之後，則翻譯一本社會學理論書內關於派氏的理論，予以翻譯介紹（1964b：121-128）。

龍教授似乎未受大理論（grand theory）的吸引，他對抽象程度太高的論述似乎有著反感。他不曾特意的介紹什麼樣的社會學理論。除了對社會學的一般性介紹之外，他的文章特別集中在人口、都市、家庭以及和這幾方面相關的社會問題。他的整個的取向還是在1930年代的經驗社會學的範疇之內。他相信社會學是科學的，運用社會學的科學方法，一方面可以讓我們正確瞭解社會現象，同時也可以提供我們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他甚至對民國二、三十年代的中西文化論戰，也採取非常客觀的態度。他說：

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或建設中國社會的事業，最基本的條件或工作乃是社會文化現象的研究。這種研究就是以科學方法和客觀的態度去分析和瞭解中國社會的社會問題。這樣研究所得的結果，便是我們改良和建設中國的參考資料，所謂建設中國的文化便需以這樣的資料為根據，而借多方面的力量，從多方面去進行改良與建設的工作。由我們的研究所得，也許我們需要的是中國固有的方法與原料；也許有些地方我們所需要的是外國的方法和原料。這完全要以我們的研究所得的為根據；．．．．．如果這樣的去從事工作，我們便用不著高唱復古，全盤西化，中國本位或二五一十的折衷，其實這樣去從事工作，我們應用的方法，所得的效果，以及這種方法和效果影響於我們人民生活 and 社會組織的總和，便是我們中國的新文化（1964b：398-399）。

應該是在這樣的想法之下，他把介紹社會學方法當作自己的任務之一。除了主編的《社會研究法》之外，他有《社會調查概述》和《社會調查與社會工作》兩本文集。在《社會調查概述》自序中，明白的說，在近代國家裡，為了明瞭國情和改良社會狀況，社會調查乃不可缺少的一種工作，也是現代國民應有的一種知識。因此，一般先進國家莫不注重和利用它。該書介紹了歐美和中國的社會調查發展史。人口、社區、都市和家庭是他所感興趣的實質領域，他在人口和都市方面都有專著（1955；1972a），他所談論的社會問題大都與這些主題相關。他對社會學的科學性和實用性的堅信，再加上他的社會問題和社會改良取向，使得他的文章不少是有關社會行政、社會福利和社會工作的。他明白美國的社會學與社會工作或社會福利已經分家，但是他認為在中國社會學仍屬起步的階段，兩個學門合在一起，並無不妥。他認為像社會部的成立，有利於社會學的發展。而政府的社會福利部門若有較多的社會系畢業生服務其中，業務將辦得較好。

龍教授非常注意社會學在中國和臺灣的發展。〈中國社會學的回顧與前瞻〉（1964b：79-96），〈社會調查在中國的發展〉（1963：69-90），〈中國社會學者的出路問題〉（1974b：61-64），〈社會學在中國的地位和職務〉（1974b：65-84），〈社會學在臺灣的發展〉（1970：1-14），以及〈國立臺灣大學設置社會學系的來龍去脈〉（1974b：85-95），等五篇文章，可以說構成了他眼中的中國社會學發展史。我們若想要對1949年以前中國社會學的著作、譯作和調查報告，以及光復後臺灣社會學的初期發展得知梗概，他的幾篇文章，可以是很適合的導論，提供了相當完整的書目。他談社會學在中國的出路，很自然顯示出他對社會學在中國生根的企盼。他的自述中，雖然自認是文化的混血兒，但他也感覺到西方傳來的社會學是能夠運用在中國社會的問題。

他在論尼斯柏（Robert A. Nisbet）的《社會學的傳統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1974b：42-50）時指出，社區、權威、地位、神聖性、和疏離這五個概念，在西方的社會文化裡，經過一百多年的演變，都受到許多社會學家的採用。從這些概念的歷史背景觀察，無一不是從歐洲社會文化中發展出來的，同時引用這些概念的社會學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說法。我們不是屬於歐洲文化傳統的人，是否應該照禮教採納，倒很成問題。他更進一步認為，科學雖應該沒有國界，社會科學倒不一定如此。社會科學的運用應該因各國的不同社會情形不同而有所改變。他提到民國二十六年時的中國社會學年會，已有人提出社會學應該中國化的問題，但如何中國化，卻一直不再有人特別加以注意和討論。他說，「（西洋社會學的概念、理論和方法當中）有些固然值得我們採用，有些只能作為我們參考。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以我們自己的國家社會現象和問題作為我們主要的研究對象，特別要注意我們的社會文化傳統之探討。從我們直接對自己的研究當中，我們可以提出新的概念理論和方法。這樣才可以建立我們自己的社會學。」他認為中國有關社會關係和社區的概念與事實都有不同於西方社會同類現象的內涵。他舉出中國社會學值得研究的幾個方向。如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模式，對生態的破壞，教育專業化與體系的形成，不同宗教的相容並存，文學與社會的關係等。

從龍教授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一個極其明顯的意識形態，即他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憎惡。他在介紹中國社會學的發展時，論及中共統治下中國社會學所遭受的摧殘，慨嘆中共對中國傳統秩序的破壞。他懷疑中共1953年發表的人口數字。討論當代流行的社會政治意識時，褒社會主義而貶共產主義。討論美蘇兩文明與人類前途時，他認為獨裁政治，禁止宗教，和意圖赤化世界，是蘇聯的三大弱點，若蘇聯統治了世界，人類將瀕臨前所未有的大危機。他更指出共產黨敵視社會學的原因：社會學重社會研究法，重

分析，不偏任何因素，而共產黨徒偏重事務的一面，即經濟因素；社會學注重合作，共產黨提倡階級鬥爭；社會學不忽視個人，而在共產社會的組織下，毫無個人地位與自由；社會學承認任何社會都有它的歷史背景，而共產黨視一個社會的傳統為封建思想。他認為自己能逃脫共黨來到臺灣乃明智的選擇，而悲憫留存大陸社會學家的命運（1974b：25-31；51-60；82-84）。

三、經驗與歷史研究

（一）臺灣都市的研究

龍教授的經驗研究，大部分是有關都市方面的研究，他在人口方面的成果，也可以包括在內。他這方面的研究，與臺大社會系創系的目標關係密切。他在臺北市社會基圖的序言中，明白指出：「國立臺灣大學於1960年夏獲得美國亞洲協會的經濟援助而設立社會學系，．．．．．。在研究工作方面，我們特別著重都市社會的實地考察，一個理由是因為我們的校址是在都市裡，我們藉此以瞭解自己日常生活的直接環境，並以這種環境作為教學的實驗場所，使理論與實際的情形有密切的聯繫，使學生也易得到實習的機會；另一種理由是因為我國的農村的研究已有人做了許多，而都市的社會學探究卻尚屬少見。換言之，我們的研究計劃是以臺北市當作我們的實驗室，應用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去探究本市的各種社會現象和問題。」在如此的動機之下，朝著仿效早期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作法（郝繼隆，1974）。龍教授在美國進修的1930年代，正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都市研究竄升之際，他自己的學位論文雖未以都市為對象，但他該感受到芝加哥學派竄起的風潮。在這種取向之下，而有臺大社會學系的一系列集體研究以及他個人的都市研究。

集體的研究，首先是開始繪製臺北市的社會基圖，於1965年印行出版。該圖集收納了五年間繪製的約九十幅中的四十九幅不同社會變項的分佈圖。分成六大類：社區概況、人口、工商業、教育文化機關及民衆團體、以及貧戶、犯罪和交通災害等社會問題。除利用各種官方統計和民間團體資料之外，部分尚輔以實地調查所得。像未收入本圖集的家庭文化設備的分佈狀況，是以抽樣調查的結果加以推估的（寇龍華，1963）。這樣的社會基圖，從芝加哥都市社會學的觀點，可以是瞭解一個都市社會的起步，也是進一步研究的參考點。可惜的是，未見後續的有關臺北市區位結構（ecological structure）的整體描述和理論探討，同時也沒有就此為臺北市區分出有意義的社會地區，以作為小地區深入研究的參考。另外的集體研究則是古亭區的社會調查（1967b）。原初的構想是，臺

灣、中興和師範三所大學的社會學系或社會工作學系共同合作，各就其所在區，即大安、古亭和中山，進行全面的社會調查。後來因為經費不足，而由臺大社會學系獨自在古亭區推動，這是傾全系師生之力的一項研究。從區位結構、人口和家庭、工商業分佈與居民就業狀況、教育與文化組織、宗教組織、人民團體組織、社會福利組織、娛樂組織、醫療組織和房屋概況等九大方面來呈現古亭區的面貌。其中第二、第三和第十章，以實地觀察和問卷資料分析，所留存的一些成果，是一般官方資料中所不易獲得的。

龍教授個人的都市研究，主要有兩樣。一是〈近二十年來臺灣五大城市人口動態與靜態之比較研究〉（1972b）。這份調查報告，除人口的變化外，尚討論了都市的功能性質，各都市內部的功能區分，以及都市的社會問題，因此比較是一個都市的而非人口的研究。在研究中他指出，五大都市從幾個指標來觀察，都由同質走向比較異質。社會增加雖是人口增加的重要因素，自然增加仍為主要來源，同時由於人口平均年齡都在二十一歲以下，人口仍都處於增進的狀態。不過從功能上還是可以將之分成不同的類型，臺北為異種功能的都市，同時是商業、文化及政治的中心；基隆以其海港特性，可稱為商業都市；臺中、臺南都有其文化的特性，但比較宜於安居；高雄則是工業都市。是以五大城市各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地理環境，因此發展的型態與呈現的特徵也稍有不同。此研究的特色之一是，闢一專章，以實地觀察和訪問地方主管官署的資料，討論都市的社會問題。他指出，五大城市呈現的住宅、地價、環境衛生、犯罪、娼妓、貧窮、文盲及都市計劃等問題，直接間接與人口成長和都市的結構狀態有關。這些問題，除了文盲之外，似乎都是我們仍然面對的都市問題。

另外則是〈臺北市郊區四市鎮之人口結構與變遷之研究〉（1972b）。這篇論文的特色，在於將三重、永和、新店和淡水四個市鎮作為臺北都會區的一部分，探討它們和臺北市之間的關係。筆者以為，這是龍教授最好的一項經驗研究，探討1960年代臺北都會擴張，為日後的探討設定了一個比較點。筆者覺得最珍貴的一筆資料是問卷分析顯示的人口遷徙現象。四個市鎮中，淡水本籍的人口比率極高，顯示臺北市以西和以南地區的發展，快於以北的地區。再看遷入人口的來源地，三重、永和與淡水，由臺北市縣以外地區遷來的人口數大致相當；而新店則是臺北市縣以外遷入的較多。可見，臺北都會的外圍地帶，同時吸納中心都市的外移人口以及鄉村遷入都市的人口。但是，永和、新店和淡水，從臺北市遷入的人口絕大部分是外省籍的，只有三重市由臺北市遷入的人口以本省籍的居多。此外臺北市遷入永和、新店和淡水的，教育程度較高，遷入三重的極其偏低。這種籍群和遷徙的關係，是研究光復初期臺北都會區擴張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

這篇論文也設定了郊區與大都市距離影響及郊區的都市化程度，與中心都市的社會經濟關係，地價的上漲幅度，以及住宅問題的嚴重。結論是郊區與中心都市的距離確有很大的影響，但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三重比永和更接近臺北市，但永和在人口成長的速度、與台北的社會經濟關係以及住宅租借的比率，均高於三重。這與上述人口遷移的性質可能可以串連起來。

龍冠海教授有關臺灣都市方面的研究，大致包括了芝加哥學派的重要主題：區位結構、社區研究、以及郊區化的過程。不過在他的研究取向上，應用的性質甚強。在領導臺大社會系師生進行古亭區社會調查，目的在於選取學校附近地區，瞭解其一般狀況，特別是它的問題與資源，以供將來推動社區發展時的參考，而有關社區內各種組織的描述，不在於探討這些組織在社區內的角色以及這些組織與社區性質之間的關係，而著重於各組織在未來社區發展上可以提供什麼樣的資源。以人文區位學觀點而繪製的臺北市社會基圖，在呈現社會現象的空間分佈之後，並未檢討其區位模型的性質。有關五大都市和臺北郊區的研究，目的都在找出重要的社會問題和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芝加哥學派的命題，在他而言，只是提供瞭解社會現象的一些向度罷了。於是，幾乎每一篇研究報告的結論，都不是理論意含的反覆討論，而是問題與建議。由於保留了某一時期一些地區的實際狀況，若給予重新註釋，在臺灣都市性質的變遷上，可以作為我們研究的一些參考點。

龍教授的都市研究雖顯示濃厚的社會問題取向，並不意味著他對臺灣社會發展持批判的態度，他只是客觀指陳應該改進之處。對臺灣的發展，他認為可以用 L. F. Ward 的社會導進（social telesis）的概念來描述。他以 1960 年代主流的現代化指標，認為：從人類關係的角度，是由家庭取向類型走向契約類型；從生活型態觀察，是由鄉村狀態走向都市狀態或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從社會控制的觀點，是由神聖類型趨向世俗類型。總之，主要的趨向是從傳統走向現代化，其手段是和平、漸進而民主的（1974a：179-180）。他也認為臺灣的都市發展會越來越均衡（1972b：302-303）。

（二）社會思想史的研究

若要龍教授自選他的學術專長，社會思想史的分量可能要勝過都市社會學。他在 1966 年出版了《社會思想史》，該書其實應該名之為西洋社會思想史。在 1976 年，還自印了《社會思想史小傳》。他認為社會思想家的傳記可以讓我們瞭解思想家與社會文化變遷的關係，瞭解社會思想所反映的社會文化狀態；同時社會思想家的思想可以啟迪我們，社會思想家的人格與處世之法，可以為我們的借鏡（1976）。就因為這樣，他特別

喜歡閱讀社會思想家的傳記。這也可以說明他對研究社會思想所把持的基本態度。而他自己所最愛的，應該是中國社會思想的研究。自他取得博士學位之後，這項研究便沈寂下來。他在1970年以後，他似乎感覺到時間的壓力。一方面積極整理往日的作品，加以編輯出版。在1972年，《都市社會學理論與應用》一書和〈都市社會學在中國的展望〉一文的相繼出版，似乎是他對都市社會研究的總結。此後的重點則放在整理有關中國社會思想的論著上。我想，他生命最後幾年最大的願望是完成本中國社會思想的專著。他的博士論文係將碩士論文擴充而成，名之為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Thought*，由1933至1935年撰寫。他認為自己有關中國文化的底子不好，學校雖然要求出版，總覺得不夠，應該加以充實，迄未如願。

1970年以後，龍教授先將早期發表過的幾篇英文作品，包括有關法家和墨子社會思想的討論，收入《中國社會思想論叢》（1974a：19-87）中。此外，也分別發表了古代儒家（1975）和道家社會思想（1977）等論著。由於對中國社會思想的分析，都是自成單篇，並未明白說明其分析的架構。不過我們就其各篇的論述，可以看出，其理路是依據他在社會思想史一書自序中所揭櫫的，以當代社會學的若干概念和研究主題作為參考架構，大致包括如下的主題：(1) 人性論；(2) 社會、國家及政府的起源；(3) 社會組織；(4) 社會變遷；(5) 社會問題；(6) 社會控制；(7) 社會導進與理想社會。張承漢教授繼承龍先生的遺志，完成《中國社會思想史》的上篇，其分析的架構亦不出如上的範疇。由於這方面的論述均以單篇的形態出現，未成專書，因而未能提出適切的總結討論。不過他晚年時曾講授三個自認一輩子都在思考的概念：人類對和諧的追求（*striving for harmony*），選擇性的演化（*selected evolution*）以及人類中心主義（*homocentrism*）。這三個概念可以說是他在研究中西社會思想之後，所最期望發揮的三個命題，他似乎也認為它們可以運用來解釋社會思想以外的社會現象。

在他碩士論文的結論中指出，思想家們常試圖預測社會的命運，同時根據自己的心智想導引社會走向理想的目標——和諧的目標，對思想家而言，和諧是個普遍法則，在人類與自然之中都存在著，或可說，存在於整個宇宙。東西的許多思想家的哲學均顯現這樣的觀點。中國先秦的哲人，如孔子、老子、墨子和韓非，雖然被歸為不同的思想流派，他都各有其對和諧的追求。老子的道與無為，孔子的仁與禮樂，墨子的兼愛與尚賢，韓非的尊法與治吏，都呈現他們對和諧的看法以及追求和諧的方法。他認為和諧的法則亦可見諸政治的實踐以及社會組織的運行中。人的一生同樣可以視為獲得和諧的歷程，在尋求個人身心的和諧，在尋求個人生活與團體生活之間的和諧。這麼重要的一個普遍

法則，卻很少人瞭解其對人類生存史的意義與重要。每個思想家都有別於他人的和諧的概念和實現和諧的策略，就因為如此，我們的世界是衝突的，在這世界，和諧並不是垂手可得。不過社會變遷和世界的進步，主要還是在追求和諧的衝突傾向中所滋生。他將這種傾向比喻做，走向不同的河流，譜成不同的音樂，可以為善可以為惡，不過都朝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大洋（1974a：13-17）。

選擇性演化的想法則呈現在〈社會思想之性質、範圍與發展途徑〉一文中。該文後來便是《社會思想史》一書的導論。他論道，社會思想發展的性質有幾個特徵。首先是演化的，一個人的思想有其變化，可能前後大同小異、大異小同、甚至完全不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和整個人類的社會思想也有同樣的趨勢。以中國的社會思想而言，從孔子到康有為的儒家思想都有不同。其次是累積的，後一代的人承襲前一代的社會思想之外，還會加上新的東西。社會環境的變遷使人必須用新的思想來應付。文化是累積的，社會思想也是累積的。第三是選擇的，不同時代的思想不可能是一樣的，同一學派不同的人物，思想也不會完全一致。思想家們在思想上都有其選擇的作用，個人和社會文化的因素都會影響他們的選擇。以中國的儒家而言，由周初、孔子、孟子、荀子以至董仲舒，都有所不同，再由韓愈至近代的康有為則更不同了。他的累積的概念可以放在演化的概念之內，因此社會思想的變遷性質可以用選擇性演化的概念來說明。對於個人的生命歷程以及社會的變遷，龍先生同樣認為可以用選擇性演化來解釋，人類社會文化的累積過程中，個人的選擇可以是社會變遷的因素之一。他把自己如何選擇社會學為終身的志業，如何會逃離大陸在臺灣渡過後半生的學術生涯，也以在社會文化變動下的個人選擇來說明（1964a：29-30；1967a：10-11）。

人類中心主義的說法，並未在他的作品中直接談論。他認為要是沒有有知識的人類，沒有人類在這地球之上，這地球會完全不同的。譬如為什麼有上帝，那是人創造的，為什麼東西有上下之分，為什麼世界有中國外國之分，都是人們所創造的。希臘哲人 Protagoras 曾說過「人是萬物之衡量（Man is a measure of all things）」的話，他的人類中心主義也是這個意思。既然以人類為中心，我們應該注重的是什麼呢？中國的儒家思想，希臘的社會思想，西方開明時期的人文主義（humanism），都可以與這個概念相關。社會學之中有人文主義社會學（humanistic sociology），不過他認為他的人类中心主義與之有所不同。人文主義社會學注重的是人類價值的研究，強調人的自由平等，以及人類的尊嚴，而從人類中心主義來著眼，人類生命是最寶貴的了，最應注重的是人類的社會福利。他認為社會學裡應該有一門福利社會學（Sociology of Welfare）。在他的

這種看法裡，很明顯的指出，人類自由平等與尊嚴的追求，並不能達到真正的人類福利。由於沒有專文的討論，我們很難明白其背後的邏輯。不過他對社會福利的重視，倒可以在他不少的文章中顯現出來。他曾說，社會學家對於社會建設的觀察至少有一個共同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社會福利。在前面我們也說明過，他對社會學知識用於改造人類社會，充滿著信心。

四、結語

龍教授的一生下經歷著中國社會的最大的變動，他由海南的小學生，新加坡的中學生，清華的預科生，以至於留美的社會學博士，可以說是這個變動時代的產物。他自認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兒，則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大部分都有的感受。他從小學以至清華預校，比起大多數同時代的受過高等教育者而言，可能受了更多西洋文化的薰陶，不過他的研究興趣卻相當放在中國的社會思想，他自認為中國文字的底子較差，卻使他遲遲未將這方面的成果系統的公諸於世。他與同時代的社會學家一般，感於當代中國的落後，雖有學理的興趣，卻無法捨去改革社會的情懷。他的文章和研究正反映他對傳統文化的依戀和對當代問題的關注。

第一是他的社會問題取向。雖然他曾經認為對社會學的一項誤解，是把社會學當作社會改良，這樣子把社會學看待太狹窄了，同時蔑視了社會學的學術性。不過他認為社會學的學理對社會改良非常重要。他的論著之中，很多是有關現實社會問題的評論，包括賣淫、婚姻與家庭、勞工關係、少年犯罪、住宅、人口與都市成長等。他在社會研究法之中，特別注意社會調查，他強調社會調查與統計對社會建設的重要。在這樣的取向之下，他雖知道社會學與社會福利或社會工作終究是應該分家的，卻很自然認為社會學系應培養社會學與社會福利工作人才。雖然在外籍顧問和亞洲基金會只協助純社會系的設立，但是台大社會系的訓練中，依然包括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而臺灣的各個社會系都蘊含這樣的課程安排。這或許是光復後第一代社會學家的共同看法²。這取向同樣影響了他的經驗研究。他的經驗研究主要在人口與都市方面。在領導臺大社會學系師生進行的古亭區社會調查，目的便在於選取學校附近地區，瞭解一般狀況，特別是社區的問題與資源，以供將來實施社區發展計劃之參考。有關臺灣五大都市人口變遷和臺北市郊區四鄉鎮人口結構與變遷之研究，目的都是在提出值得注意的問題，而非對既有的社會學理論的檢討或修正。在以人文區位學觀點下製作的臺北新社會基圖，在呈現社會現象的空間分佈之後，並未針對都市社會學的區位模式加以進一步的討論。

第二，雖然龍先生在社會學的浸淫中，西方學說的影響不言而喻，但是他在檢視 Nisbet 提出的五個西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時，有感於各概念都有好些不同的說法，而懷疑它們的普遍性。他不認為社會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他也關心社會學中國化的問題。他認為中國的一些概念和現象，都有不同於西方社會同類現象和概念的內涵。一些中國歷史上的社會現象，若加以運用和探究，可能發展出一套新的社會學概念、理論和方法。他自己在這一方面，則從中國社會思想著手。他心中所最珍視而最想發揮的可能就是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他曾提出三個他一輩子都在思考的想法。首先是人類對和諧的追求與爭取，每個人或每位思想家都有自己對和諧的看法，都有自己實現的途徑，這世界因之是衝突的，和諧反而難以達成。其次是選擇性演化，強調人類的選擇是社會變遷的重要因素之一。最後則是人類中心主義，如此的想法與人文主義社會學近似，重點有所不同，側重人類的福利，建議應該創設一門福利社會學。

龍教授最想發展的觀念，都是他在碩士和博士論文的撰寫期中便孕育的。此後便未再進一步申論，最後則以單篇的論文分別發表，未能撰成中國社會思想史的專著，可能是他自己學術生涯所最感遺憾的。筆者以為，龍先生有關現代社會的探究以及中國社會思想的探究，都蘊含著追求人類福利的理想，但是這兩方面的探究並未能連接起來。在第二節中，我們提及龍教授有關建立本土社會學的看法，他主張兩個途徑。一是對自己國家社會現象的研究，他有關都市現象與都市社會問題的研究，應該就是這路想法的實現，但是由於他的社會問題取向，使他只是以西方社會學的方法和概念作為瞭解社會現象的工具，並未用力於概念的反省和檢討，因此未能達到社會學中國化的期望。另一則是注意我們社會文化傳統之探討。這方面的實際作為便是中國社會思想史的研究。在這研究裡，他找到了有意義的命題，是他對人類社會文化變遷的看法，以及對追求人類福利的看法。這些命題都有發揮的可能，但也都有很多值得澄清的地方。譬如，和諧追求時所產生的矛盾，如何可能取得平衡點？什麼樣的個人的選擇導致了人類的變遷？社會文化與個人行為之間如何相互影響？社會學的知識，如何有益於人類福利的達成？這些大的命題，似乎與人口與都市方面的經驗研究，沒辦法直接串連起來。換言之，他在概念發展上，並未能與他的經驗研究關聯起來。

葉啟政（1984：7-8）在悼念龍先生的文章中提及，龍先生曾指著藏書對他說：「都太陳舊了！我老了！也落伍了！」，葉先生認為這是邊陲社會學者追趕主流社會學所難以逃脫的命運。龍先生自認為是東西文化的混血兒，他受西方知識和社會學的影響甚深，但仍感嘆跟不上潮流。他覺得西方社會學的概念，不見得放諸四海而皆準，他研

究中國的社會思想，卻感慨自己國學的底子不夠。受著現實的牽繞，以及對現實社會的關注，他無法專心於發展自己年輕時代所已醉心的命題。西方學術，中國文明，以及社會現實，在他學術生涯中交織著，很難理出一條分明的路子。作為龍先生學生或後輩的臺灣社會學家，雖然在知識的接觸上，不見得會比龍教授曲折。但大家似乎也是在東西文化的混融之下，希望找到出路，社會學中國化的想法，還是糾纏著我們³。如何從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的社會現象中汲取和鑄造概念，展現我們學術的自主性，仍是我們所共同面對的難題。

註釋：

- 1 有關龍教授生平係參考以下的幾篇文章：A Chinese Student and Western Culture (1974a：1-11)；我為什麼愛上社會學(1974b：56-60)；留美回憶的一章(1964a：185-203)；國立臺灣大學設置社會學系的來龍去脈(1974b：85-95)。
- 2 葉啓政(1985：91)曾以實務與學術的誤置論斷這一現象。但是從龍先生的文章裡，我們知道他很明白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的不同，也知道依學術的發展趨勢，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的教學勢必兩分。不過當時的社會學者，在社會問題取向濃厚之下，認為社會學不宜過於理論化，而臺灣當時又無社會福利或社會工作方面的學系或專門學院，將社會學與社會工作放在同一個學系裡，似乎是相當合理的。而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發生密切的關聯，在中國社會學發展的早期，與美國早期的相似，是個普遍的現象，同時社會問題取向的濃厚，亦是當時社會學的特色之一(1964b：90-92；1974b：88)。鄉村社會學的發展是放在臺大農業推廣學系，應該是同一種想法下的產物。雖然社會學與社會工作或社會福利在臺灣的大學裡已明顯區分，不過社會學的實用的性格，在社會學的研究裡，仍占相當的分量(蕭新煌，1984：304)。
- 3 有關社會學或社會科學中國化的討論，在1980年代初期可以說是討論的高潮，臺灣社會學的依賴或邊陲性格及其發展的困境，也是很多人一再檢討的問題，比較集體的討論可以見楊國樞和文崇一主編的《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1982)以及李亦園、楊國樞和文崇一等主編的《現代化與中國化論集》(1984)。

參考書目

* 龍冠海教授的文章絕大部分都已收入他的幾本論文中，本文所引用的，完全以論文集的頁次為依據。若對龍教授的全部著作概況有所瞭解，請參考張承漢和林義男（1982）編的龍冠海教授著作目錄。

李亦園、楊國樞、文崇一編

1984 現代化與中國化論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郝繼隆

1974 恭賀龍冠海教授創設臺大社會學系及社會學刊二十年，臺大社會學刊 10：1-7。

寇龍華

1963 臺北市民家庭文化設備調查報告，臺大社會學刊 1：101-116。

張承漢、林義男

1982 龍冠海、郝繼隆教授事略及著作目錄，臺大社會學刊 15：224-235。

楊國樞、文崇一編

1982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葉啓政

1984 一位寂寞的社會學家——我所接觸的龍冠海教授，見臺大社會學系暨研究所編印，龍冠海教授郝繼隆教授逝世週年紀念特刊，頁 5-8。

1985 對四十年來臺灣地區社會學發展的一些反省，中國論壇 21(1)：88-104。

龍冠海

1952 社會學講話。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1954 社會學概要。臺北：東方出版社。

1955 中國人口。臺北：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

1963 社會調查概述。臺北：文星書店。

1964a 社會與人。臺北：文星書店。

1964b 社會學與社會問題論叢。臺北：正中書局。

1965 臺北市社會基圖（編著）。臺北：臺大社會學系。

- 1966 社會學。臺北：三民書局。
- 1967a 社會思想史。臺北：三民書局。
- 1967b 臺北市古亭區社會調查報告。臺北：臺大社會學系。
- 1967c 社會研究法。臺北：廣文書局。
- 1970 社會調查與社會工作。臺北：三民書局。
- 1972a 都市社會學理論與應用。臺北：自印。
- 1972b 臺灣都市人口調查研究。臺北：東方文化。
- 1974a 中國社會思想論叢（英文）。臺北：東方文化。
- 1974b 社會學與社會意識。臺北：自印。
- 1975 “The Social Thought of the School of Confucianism of Ancient China” ,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11/12:1-24.
- 1976 社會思想家小傳。臺北：自印。
- 1977 古代中國道家學派的社會思想，臺大社會學刊 12：1-19。

蕭新煌

- 1984 再論社會學中國化的結構問題：臺灣社會學家如是說，見李亦園、楊國樞、文崇一等編，現代化與中國化論集，頁 287-328。臺北：桂冠。